

每年清明节来临,我都情不自禁地深切怀念我的两位爷爷。

第一位爷爷左寿明,一直生活在宝应复集农村。他养育了两男一女,即我的大伯、我的生父和我的姑母。三位长辈又养育了儿女及下一代十多人。爷爷从来没有离开那个千人之的村庄,他是小家族农耕生活的组织者、领头人,拥有十多亩水田,所有老小都过着缺衣少食的困苦生活。爷爷勤劳朴素、心直口快、乐于助人,这是他良好的品质。他每次走四里路去临泽买东西,碰到邻里都说,要买什么我帮你买。一次,一个大娘递给他一只空瓶子,说:“请你帮我买一瓶麻油吧。”爷爷上街买好了货物,挑着个小担子,一瓶麻油挂在扁担头上,兴致勃勃地往村里走。快到村口了,一不小心,瓶子滑落到地上打破了。他赶紧又回去临泽,先买了个瓶子,再买满满一瓶麻油回村。

1946年的一天上午,爷爷挑着粪桶在菜地施肥。镇上的五个还乡团员到村里抓了一个人,路过菜地。爷爷见状,赶忙跑上前去说:“这人是我们村的老实人,又没做坏事,抓他干什么?”他这一呼喊,邻里一些人都拥来了。一个还乡团员仔细看了看爷爷,对领头的队长说:“这个左寿明我了解,他女婿当新四军去了!”就这样,连我爷爷一起抓到镇上去了。第二天,全家人正忙着筹款救爷爷,他和其他几位农民却被还乡团残忍地杀害了。

我的两位爷爷

□ 雪安理

我要讲的第二位爷爷薛义丰,他是我养父雪明的父亲。少年时代,我对这位爷爷没有任何印象,只知道他成分不好,解放前被党的临时政府处决了。这无疑对父亲的进步有一定影响,在文革中必然受到冲击。父亲从来不跟我说,我也不敢问。直到我被安排在县党史办工作,才对爷爷的身份有了新的认知。他身材高大,为人处事公道,村里村外名声不错。日本鬼子入侵高邮,要在临泽镇选一个镇长。伪军走村串舍,经各村和镇上群众推荐,最后公认薛义丰当选为镇长。高邮、宝应是革命老区,牺牲的烈士多,出现的叛徒也不少。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,上世纪40年代初,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锄奸运动。我的这位爷爷因为当伪镇长被处决。临刑时,镇上一条河汉近百条船只,无数群众赶来,求情无果。

当时的地下党负责人刘平找到我父亲,说:“你不宜在高邮活动了,我送你参加新四军去。”二十多岁的父亲说:“我跟着你跑腿三年了,我还不是党员,你得给我个说法。”就在三联村去临泽的路上,刘平拉父亲坐在田埂上,从皮包里取出笔记本,撕下一页

纸,掏出派克钢笔,写了《我介绍雪明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》并签上自己的名字。他还对父亲说:“从此以后,你和敌人打仗,即使受伤被俘也绝不能当叛徒! 另外,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不能自杀,自杀也是叛徒!”父亲和首长告别,把珍贵入党证明揣进怀中,连夜向北,踏上了寻找新四军的征途。

刘平是一位作战勇敢、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家。当时的地下党工作单线联系,十分机密。薛义丰秘密为新四军购买枪支弹药的事,是不可能泄密的,只有部队专人和地下党组织联络。薛义丰被处决后,刘平尽快介绍雪明入党和参军是顺理成章的事。爷爷的事情在高邮党史调查中获得验证。那一年,老干部胡雨亭、居宜、张老带领我和夏金明去泰兴作党史调查。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女性老干部。她在回顾高邮党史时,说了一句话:“高邮那个薛义丰不该杀,杀错了! 他是暗中为新四军做事的。”夏金明作记录。我当时虽默然无言,但心中很激动。我回家告诉了父亲,他说:“在革命的风浪中,这些事在所难免。能有这个说法就行了,可惜太晚了一些。”

我悼念两位爷爷的时候,总是对家人和亲友们心平气和地说,想想两位爷爷当年的境遇,我们在工作生活中,还有什么对个人的曲折困难丧失信心呢? 还有什么对家庭邻里、领导和同事之间的矛盾解不开呢? 还有什么对社会现状牢骚满腹不满意呢?

前段时间约工匠师傅修缮老家的房子,师傅让发个位置给他好认路,就便打开高德地图,发现竟然标有“格头古”这个老地名,由不得思绪回到了四十多年前。

“格头古”这三个字应该怎么写已无从考证,高德地图上估计也只是音同而已。格头古是我老家过去一个大庄子的称呼,记得还是童年时老辈人这么称呼过,到了上世纪90年代似乎再没人提起过。以我对过去大庄子地形的记忆,叫“圪塔鼓”似乎更贴切些。

格头古是个由三四十家农户聚居在一处由东南到西北向的,比平地高一米左右的高墩上的大庄子。庄子后面是一条顺着高墩子走向的深河,称之为河似乎也不大恰当,因为里面的水并不流动,就称之为深水塘吧。靠着水塘自身的净化功能,几十户人家生活用水得到了保障,好在那时候还没普及化肥农药,污染少,水浅时也能清澈见底。也不知是先有水塘,然后人们依水而居,还是人们先选中这里,然后挖塘聚水并取土筑高成墩而居,将房子建在高墩上应该也是防洪的需要吧。后来估计是因农田灌溉的需要,在高墩子中间开了一条南北向的灌溉渠,沿渠修了一条土路,将大庄子一分为二。一个大庄子却分属东方、胜利、稻家三个生产队。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农村人都知道,东方、胜利的队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;为何单单有与时代不合拍的稻家生产队呢,况且这个生产队姓嵇的只有一户人家,这个疑问缠绕了我一段时间,后来听说他家有一位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,由此我也就想当然地不再疑惑了。

庄子上以王姓、郭姓居多,徐姓也有几户,王姓中“宝”字排行的辈分最高。读过几年私塾的宝龙老太爷算是格头古最德

格头古往事

□ 王庆阳

高望重的人,庄子上邻里之间有了矛盾纠纷,只要他出面便能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;当然也没什么大事,矛盾纠纷也不多。

格头古人跟当时所有农村人一样,勤劳善良,特别能吃苦,为增加经济收入、改善生活,也动了不少脑筋。在种好稻、麦主粮田外,留出一块地来,先后种植过棉花、薄荷、茨菇,也养过蚕,不管哪一样,都是苦行当。那时候化肥是紧俏物资,种庄稼所需肥料主要是靠猪圈里的脚肥,也就是猪粪便和猪吃剩下的青草等的混合物。那个年代的学生放学后第一任务不是写作业,而是背上竹篮、拿上弯刀出去割一篮猪草,抑或是在初冬里拎着马灯、抬着柳筐随大人去树林里扫落叶,弄回来放到猪圈里沤肥料。成年人除了春节前后清闲几天,就是一年忙到头,从早忙到晚。耕种收割、打谷晒场大都是靠人力,一个生产队也只有两头老黄牛帮着犁地碾场。庄稼人夏天能被太阳晒得脱层皮,冬天两只手上龟裂的口子里能看到鲜红的肉,能有“歪子油”搽搽手那可是件奢侈的事。

尽管那时候农活很累,生活很苦,格头古人并不像现在的人有那么多烦恼忧愁,在辛勤劳作之余,大小伙小媳妇也会开些或荤或素的玩笑,寻找属于那个年代庄稼人的快乐。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格头古人人家逐步按村里庄台规划,搬迁到交通、用水更方便的排涝河或大的灌溉渠两岸,到了90年代中期都搬走了,高墩子和深水塘也被平整为农田,没有了格头古半点影子。关于格头古的记忆也就到此为止了,好在电子地图上还有它的位置。

春日漫步

□ 张爱芳

的绿色从褐色的泥土里钻了出来。这些草曾被工人们连根拔起,扔远,却不知是哪一条微细的根系没被发现——杂草总是有着违背人意的顽强。

继续向前,一片石场出现在面前,这些石头原本是散乱在一大块场地上作为防洪石的,如今已经被归拢成四方形。石场上的绿不可抑制地郁郁葱葱了,我毫不犹豫地踏上那凹凸不平的石块。蹲下身子一看,野豌豆、田紫草、阿拉伯婆婆纳还有泽漆草繁盛地紧拥在一起,似乎在密谋着给春天一个什么样的惊喜。不远处,油菜花已经不管不顾地捧出了一簇簇金黄。它们的根就扎在这无土的石缝中,让我不由不惊叹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倔强。

出了石场,向前不远即到了水景区。小路两旁多了小冬青簇拥的行道树。一根纤细的柳枝引起了我的注意,它就扎在冬青树的中间,一个深陷下去的坑与之很不匹配。我以为是谁恶作剧折断一根枝条插下去的,用力拔了拔,并不能拨动,它的根牢牢地扎在坑里。那么,是哪个工人有意而为之,为这株小柳树让了个道? 小柳树随意伸展着枝条,疙疙瘩瘩的芽苞骄傲地排列着。

走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,回首,那里似乎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,只待时间的孕育和季节的召唤喷涌而出。

球拍的故事

□ 王鸿

1978年1月我分配工作后,经常利用休息日去县体育场乒乓球馆打球。打乒乓球是我的爱好和特长,当时县总工会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全县职工乒乓球比赛,我代表电子公司参加。

为图方便,每次打完球,球拍也不带回家,就顺手放在球馆柜子里。有一次去打球,我的球拍却不见了,找遍了球馆所有柜子也不见踪影。

没有了球拍,还怎么打球呢? 况且这个球拍是顺风牌的,仅次于红双喜牌,底板弹性相当好;1972年我就使用该拍,用得非常顺手。

看见我一脸着急、沮丧的神情,时任教练倪勇对我说:“你试试我的这块球拍,也是顺风牌的,合适了你就拿去。”这怎么行呢? 这是倪教练训练用的,不能夺人所爱。“没事的,我还有块球拍。”倪教练爽快地说。

我不好意思地接过球拍,连说谢谢。试打了几下,还真不错,底板弹性、重量正好。

有了这块球拍自然很高兴,但我还有点小的烦恼。因为倪教练根据自己握柄的习惯,把拍柄锯短了,两边又被挫成了月牙状,可能这样握拍虎口小、更轻便些。但这个形状是我所不喜欢的,得改一改。我找到同学牛开澜,请他帮忙。他心灵手巧,看了拍柄的现状后,说:“只有把原先的拍柄拿掉,然后用黑色有机玻璃,按照拍柄的原先尺寸,再重新做一个。顶部和两边的缺口,可用木头填上,再用小刀削平、砂纸磨平。你看这样行吗?”“好,好!”我连连点头,“让你费心了!”

不到一个星期,装上新拍柄的乒乓球拍就摆在了我的面前,黑色有机玻璃的拍柄,十分标准,漂亮光滑。我随即来到乒乓球馆,试了试,非常合手,馆内的伙伴们也纷纷赞不绝口。

就是这块普通的球拍,随我多次征战县(市)职工乒乓球比赛、机关乒乓球比赛、扬州市局级干部乒乓球比赛和省编办系统乒乓球比赛,且取得过不俗的战绩。

这块当时只有几元钱的球拍,早已过时。随着乒乓球运动技术的突飞猛进,球拍也得以创新飞跃,纯木球拍、碳素纤维球拍、芳基纤维球拍、芳基碳素复合球拍等等,价格有的达上千元。尽管我也买了新球拍,但这块超过50年的“古董”球拍始终珍藏着,并且在交替使用。

东后街上有一处大杂院,当时俗称“农干校”,至于为什么这样称呼,我没有探究过,它的前身是干什么的,我也没有细问过。我是五十多年前搬进去的,里面住着二十来户人家。当时,院内有条黑狗,见到陌生人就追着叫,身为少年的我很害怕。养狗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看家护院,不让陌生人顺手牵羊。因为全家刚入住,狗不熟悉我们,所以就认定我们是不速之客。紧隔壁人家也有一条狗,黄的,平时不怎么叫,据说是真下口咬人,好在我们常与它的小主人玩耍,所以就不拿我们当外人,有时候还摇尾巴示好呢。

这两条土狗,早就不存在了。

除了土狗的不存在,房屋原先的风格也不存在了。以前有穿堂,也就是一排房屋中间有一间空房,前后贯通,供后排屋的居住者进出,属于公共场所。夏天乘凉,搬张小桌子,打牌、下棋、讲故事,那是最好的,穿堂风吹在身上很舒服。几步远还有凉亭,大家同样可以在此休息、闲聊。院内有两口井,淘米、洗菜、洗衣服,这是共享的,大夏天可以将西瓜沉下去冰镇,也是交流厨艺和展示生活的窗口。每间房连成一片,一家挨着一家,有走廊,下雨天淋不着雨。除此

农干校大院

□ 陈忠友

而外,还有男女大茅厕,木板下面是粪坑,届时有人来清理带走用作肥料。

而今,青砖石灰墙上粉刷了水泥砂浆,或贴上了瓷砖,木门木窗几乎都改换成铝合金,院内空地上盖起了一排排小屋,或竖起小楼,或举起阳光房,水井的上面也被充分利用成了建筑物。可以这样说,原先偌大的空间已然曲径通幽,仿佛乡间小道。更突出的,临街傍巷的住户破墙而出,另立门户,就连大茅厕也摇身一变,不再属于大院,成为公厕。

变化最大的是,机关干部搬走了,教师搬走了,医生搬走了,而且,从这里起步的大学生再也没有回来,从这里创业的成功人士也再没有回来,剩下的,少年变中年,中年变老年,成为留守,许多的老邻居被不相识的新邻居替代。

如今,估计已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座大院曾有过“农干校”的称谓。

什么样的称谓并不重要,重要的,生活如奔流的江水,永不停歇。

四弟

□ 赵旭东

1963年6月,我们家从高邮县城半家下放到外婆庄子。由于刚搬家到乡下,还没有建新屋,大舅腾出一间东房给我们暂住。7月,四弟在这间屋子里降生了。为了庆祝四弟出生,我们家在全生产队范围,每家散了三只红蛋,盛了一碗糯米粥。

四弟上学是很聪明的,也很用功。8岁开学上一年级(那时,已有类似于幼儿园的“学前班”),每年升级,15岁初中毕业(那时期小学5年,初中2年)。如果像后来那样凭文化考试成绩升学,四弟继续上高中是稳稳的。可是,1977年,升高中还在走“贫下中农推荐、大队革委会评定、公社党委批准”的老路径。就因某大队干部一句“他家大女儿上了医专,另外一个女儿、一个儿子双双上了高中,高中就给他一家子上啊”,四弟高中梦成泡影了。这也许改变了四弟一生的命运。因为,1977年、1978

年已经恢复高考,以四弟的智商和勤奋,高中毕业之后,考上大学应该没有问题。那时,大学毕业后,国家统一分配工作。

无奈之下,15岁的四弟选择了就业。先是于1977年底到一沟农机具修造厂工作了近三年,后于1980年调入县属高邮县自行车零件厂,并于当年底参军入伍。

1983年上半年,命运又一次让四弟失去了拥有好工作岗位的机会。这一年施行“国家干部离职,子女可以顶替”的政策,但顶替者必须是未婚、非正式工作、非现役。本来四弟是我们家唯一符合顶替父亲的条件(其他三姐弟都已婚),但“非现役”这一条规定,硬生生地将他挡在了政策门外。

四弟1983年底退伍退役,按退伍军人常规安置政策,进入县属企业——高邮县自行车零件厂当了一名工人。2003年,企业改制,买断工龄,自谋职业。四弟先后在市拆迁办、拆迁公司等单位工作,于2023年6月退休。

四弟退休生活是幸福的。